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陈倩 著

东方之诗与他者之思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东方之诗与他者之思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陈倩 著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之诗与他者之思：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 陈倩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ISBN 978-7-301-28515-2

I. ①东…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7908 号

书 名	东方之诗与他者之思：海外中国文学研究 DONGFANG ZHI SHI YU TAZHE ZHI SI
著作责任者	陈 倩 著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15-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6820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320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荣获中国人民大学 985 工程资金资助

目 录

第一部分 绪论 001

绪 论 003

第一章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013

第一节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 013

第二节 欧洲的中国文学研究 023

第三节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 042

第四节 其他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 074

第二章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和期刊 085

第二部分 经典案例 109

人文学的社会科学转向：葛兰言的古典研究 111

文学与思想史的融汇：史华慈的先秦典籍与近代译介研究 132

经由“他者”而思：于连论东西方美学 164

“文学的自觉”：铃木虎雄的古典文学探源 192

“迷宫”中的求索：宇文所安与经典重释	212
从“名物学”到俗文学：青木正儿中国考	239
明清白话小说的现代阐释：以韩南、浦安迪为中心	260
“抒情”与“史诗”：普实克的“历史意识”	284
从古典到现代：顾彬的文学史观	305

第三部分 结语 335

结 语 337

第一章 域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趋向 340

第二章 “汉学主义”：思考与论争 348

第三章 超越“中国中心观” 354

附录 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品 359

参考文献 389

1

第一部分 绪论

绪 论

世界与中国一直在彼此“观望”，自中外有交通史开始，国外已有了零散的中国研究。如果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1599年来华，并在若干年后写出他的《天主实义》（*Th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作为起点，欧洲的中国研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的中国研究则更早。不过，直至1814年，法兰西学院增设中国语言文学教席，才标志着海外的中国研究正式进入学院体系，真正成为一门学科。20世纪初，又有大批国外学者来华，带走大量中国文物与文献，引发世界研究中国的高潮。

究其本源，海外中国学是以西方为主的文明体系对世界进行“区域研究”的一个分支，伴随着认识“他者”的问题意识而确立起来。于是便有了两种对中国的研究，其一为“内省”的，其二为“旁观”的。两者不仅并行不悖，反而时时互为补充参照。所谓“旁观者清”，海外中国学在拓展我们对异文化认知的同时，也通过“镜像效应”反照自身。缘此，1925年，刚刚从德国游学归来的陈寅恪即在清华开设“西人之东方学”的课程。尤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引介越来越多，与之对话、砥砺亦日益频繁。^①从“观望”到

^① 比如乐黛云早在1996年和1998年主编了《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和《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触摸”，借助“他者之思”，古老的“东方之诗”焕发出新的魅力。

域外中国学曾被称为海外“汉学”，指传统欧洲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即“Sinology”的译名。“Sina”（汉）原是半拉丁语半希腊语的词根，最初是“秦”（朝）的音译，另一说指代“丝”，因中国盛产丝绸。逐渐定型后，古代西欧人大多称中国为“汉”（Sina），而东欧和中东地区一般称中国为“契丹”（Cathy）。又有的史学家认为，“Sina”指中国南方，而“Cathy”指中国北方。元代以后，“Cathy”亦代称整个中国。^①“China”的流传取自“Sina”，直译为“支那”，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人大多采纳此说。总而言之，“Sinology”的原意实为“中国学”。

学界早已对用“汉学”来习惯性地指称域外的中国研究提出许多异议。原因之一是它容易与中国传统“国学”中那个和“宋学”相区分的“汉学”概念混淆。更重要的是，二战前后海外的中国研究在对象、方法、视角上相对于海外传统的中国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海外汉学相对来说更关注古代文化，而现代中国学更重视中国的现当代国情；传统汉学更多采用了与中国自身研究方法相近的人文学思路，而现代中国学善于将社会科学、人文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手段综合起来；传统汉学时代，汉学家往往自成体系，树一家之言，现代中国学则很容易激发群体效应，形成某种“范式”。

这些“范式”具有不可忽略的地域性特征。通常认为，海外中国学呈现三大个性鲜明的区域形态：日本的中国研究、欧洲的中国研究、美国的中国研究。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边界日益模糊，三者的差异似乎日渐缩小，且澳大利亚、加拿大、东南亚等地

① [法] 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中国学也开始发出声音，但总体而言，欧、美、日仍然代表了海外中国学的三种经典路径。日本因其与中国的历史渊源，比西方人更“贴近”中国，却又曾比西方更“拒斥”中国。明治维新以来，缱绻于文化母体与“脱亚入欧”的两难之间，日本中国研究意外地获得了成熟的契机：以往日本的中国学很难与传统中国的“国学”相区别，此时却随着日本文化独立意识的增强而清晰起来。欧洲中国学最能代表西方的中国镜像。中国曾一度是西方的文化乌托邦，在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等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笔下，中国人文繁盛、知礼守节。当时欧洲的各种艺术形式中均盛行中国风。可是随着 19 世纪殖民历史的全面展开，加之中国文化过于理性，缺乏宗教式的超越力量，因而在由古典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显得文化动力不足，^①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从天堂沦为了积贫积弱、肮脏愚昧的地狱。欧洲汉学不得不脱离想象，并借助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等人带回欧洲的第一手材料进入了全面、现实的中国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起步最晚，在 19 世纪，美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来中国考察、传教，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学。直至二战以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中美关系也变得日益重要。与战后的日本研究、伊斯兰研究类似，中国学成为当代美国功用性最强的学科之一。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美国后来者居上，在许多大学里都建立了东亚系，成为当今世界最活跃的中国学重镇。

国人在面对域外中国研究的成果时很容易困于两种心态：“汉学无学”与“汉学主义”。前者认为外国人看中国，终究不过是隔岸观火、难

① [美] 杜维明：《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参见《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年，第 390 页。

得要领，反而因其自身的文化预设而产生“路径依赖”。后者则坚称海外中国学在中国的兴起与近代中国思想界西化的过程虽表面不同，却实质相似，是理论与方法的再一次被殖民化，中国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东方学”意义上的“东方”而已。后文将对这两种心态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和反思，此处要强调的是，无论海外中国学是非功过如何，它已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现代中国的学术领袖们很早就关注域外中国学的动态。钱玄同曾以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汉语音韵学著作作为北京大学汉语课程的教本。陈寅恪也广为结交海外同行，曾到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家中查阅韩本《元秘史》等，^①甚至曾被聘为牛津大学教授。师从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的姚从吾，也撰写过多篇论文，推动当时中国人对德国汉学的了解。

进一步说，汉学家们对待中国并非我们想象地那般“西方中心”、鲁莽草率。当明明怀疑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时候，态度反而可能变得更为专注而审慎。事实上，大部分海外中国学家对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真诚、严肃的，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研究做出过巨大贡献。傅斯年曾评价他：

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西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西洋汉学家，每但

^① 陈智超编著：《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8页。

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①

同时，作为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的汉学家，伯希和与近代中国主流学者交往频繁，也对中国本土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9年前后，他秉持“学问乃天下公器”的公心，将大量敦煌文书的影印件提供给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陈垣、吴昌绶、缪荃孙等人欣赏、研究。王国维据其于1913年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望江南》2首、《菩萨蛮》1首；1924年，罗振玉也根据敦煌写本《云谣集》残卷，编印了《敦煌拾零》。^②同时，伯希和对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如吴勤训）和赴法求览敦煌文献的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刘半农）颇为“慷慨”。刘半农上世纪20年代游学巴黎，得阅伯希和所获文献，抄录了一部分回国，于1925年辑成《敦煌掇琐》。古文献学家王重民甚至在伯希和的支持下，在法国访学数年，整理、辑录敦煌遗书，伯希和还将自己记载的未能带回法国而在敦煌藏经洞现场所作的文物笔记给王重民阅读。^③1954年，王重民出版了他摘选出来的《敦煌曲子词集》共一百六十一首，为国内了解“唐传古乐谱”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相比对中国学人的厚待，西方学者，即使通过伯希和的导师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年）引荐，也很难看到这批秘籍，因为伯希和亲自掌管钥匙。为此，西方人十分不满，而中国近代学界对他的感情则十分复杂：他当然是名副其实的文物贩子，但若没有他，敦煌宝库实难保证不受战

① 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中国近代学术界》，《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② 刘尊明：《二十世纪敦煌曲子词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50页。

③ 桑兵：《伯希和与中国近代学术界》，《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火之毁损，近代敦煌学亦很难建立。

和老一辈汉学家相比，当代海外的中国学家受过更为严格的学院化训练。他们均是各自国家的学术精英，完全可以选择热门的医学、法律、金融等学科，却自讨苦吃专研中国文化。语言这一关就很难逾越，有的拿博士至少要10年，而且毕业出来就将面临失业的危险。杜维明1971年至1981年间是加州大学历史系奖学金甄选委员会的成员，该系每年获奖学金的十名学生中至少有三四名是研究中国的。这些学生非常刻苦，有些学中文就得花费好几年。他有个学生研究中国哲学十分艰难，五年还没摸到门径，最终不得不改行，却迅速成为美国有名的律师。^① 尽管有些中国研究成果，如颇存争议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被指受政府资助而表现出反共的政治倾向。^② 然而，更多的汉学家从事的只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他们始终抱有对研究对象的无比热忱，试将自己融为中国文化的一因子，既能入乎其中，又天然地出乎其外。如果我们仅仅看到海外中国学的短弊，而无视其洞见，显然会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事实上，海外中国学家中的相当一批人比我们自身更关心中国的传统。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有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式的情感与现实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或许终究难以避免“他者”的立场，总是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语言、方法、价值评判来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巨大的使命感，对中国传统的“消亡”感到焦虑，觉得自

① [美] 杜维明：《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参见《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② 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从“东方主义”到“西方主义”》，《读书》，1993年9月。

身作为汉学家的身份也在不断被边缘化。周蕾曾批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宇文所安指责北岛的诗歌已经不具有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特质而变得过于“西方化”，说北岛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屈从于跨国文化商业化倾向”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反省使用这种苛刻评价时的态度和话语霸权。作为西方社会的汉学家，他对当代中国诗人“不忠诚”于传统的控诉正来自于一种焦虑：对中国文化流失的担心、他本人作为汉学家的地位也面临着被抛弃。^①

尽管域外的中国研究不断深入、专业化，国人对它的认识仍然十分不足：首先，基本上还停留在“汉学史”层面的介绍和梳理，既没有较好地提炼出海外中国研究的特色、话语、核心方法与问题（近十年已有少量论文涉及），也缺乏清晰、完整的文献整理，缺乏对某些重要期刊、研究机构的讨论与介绍，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图谱”，导致后续研究的零散、失序。其次，缺乏对海外中国研究经典书目和案例的细致解剖、研读，尤其是中国学者针对这些研究的评述、回应之考察。事实上，探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同一主题的论争，从中归纳不同文化背景下学者们的对话语境和思维差异，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形成互动，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误入“汉学主义”的陷阱。最后，海外中国研究从最初浅显的经典翻译和文献整理到后来形成自己的独立学问，从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重的“东方学”到提倡“中国中心观”的范式转移，再到超越“中国中心观”，其本身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自我更新的过程。其间不同学派、不同立场的学者结论和视角也可能完全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看法也应该是多元而动态的，而目前国内对该领

^①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域的理解仍显得过于简单、粗糙。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书尝试以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为核心，“点”、“面”结合地勾勒海外中国学的图景。所谓“点”，即选取有代表性的个案和该领域经典文献进行细读，尽量客观展现海外中国学的基本路向、观念创新与得失利弊。所谓“面”，即整理、介绍、评述域外中国学的发展历史、总体特色与理论方法、相关文献与研究机构，以及中外学者的对话，希望为此后比较文学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参考。

海外中国学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们之间相互交叉，跨学科性极强。在本书有限的篇幅中，将选取最经典，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研究为坐标。当两种相异文明遭遇之时，语言与文学便是最初亦为最后的屏障，理解它才可能真正走近对方。中华悠久历史、璀璨文明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形象在他者镜子中的嬗变、中外历史的碰撞与离合，均尽显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之中。

本书拟从四个部分考察这一领域。第一部分将从宏观的层面归纳、评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欧美日中国文学研究的各自传统与主要学派、其他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以及相关期刊与主要研究机构。第二部分将以实例，分专题细剖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个案，涉及汉学家们对中国上古文献、汉赋唐诗、戏曲小说、现当代作品的代表性释读，从中了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特色。第三部分将总结、反思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发展趋向，考察国内外关于中国文学的对话与互诤，探讨我们如何理性对待海外中国学。最后，本书将列出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帮助广大读者按图索骥、研读置评。

行文至此，无论传统“国学”抑或域外“汉学”，似乎都指向了一个

明确的内核，即“中国”。实际上，“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笃定、恒一的存在。如果按照“传统的发明”之逻辑，所谓“中国性”也是不断漂移和流动的，中国从古至今存在于文明的不断融合和改造中。如此说来，“内观”的或“外省”的中国研究是否都终将缘木求鱼呢？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汉学知识的大规模引入，实则在逼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或作为一个既定事实，或被视为以往文化经验的综合体，还有没有最基本的规定性，还有没有其相对可以把握的结构与意义？

两种现实加深了本来就具有身份尴尬的海外中国研究者的困惑以及中国学界对他们的质疑：一是海外中国研究的考察对象大多集中在“帝制晚期”、近代之后。不仅因为这个时段的第一手材料更方便获得，文献解读隔离感更小，而且它更容易迎合西方社会研究异文明的功利化需求。然而晚清、近代以来的中国相比于上古时代的中国还能算是“中国”吗？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小说、戏曲中，已融入太多外来的“现代性”在其中。二是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大量渗透到人文学领域，海外中国学也未能免俗，它为中国研究带来新方法、新视角的同时，势必招来过于西化的嫌疑。不同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的宏观、感性，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更强调微观、精准，从而中国的历史、文学往往被解剖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性”似乎成了零散甚至虚构的幻影。

然而，无论政治、历史上的中国如何变迁，其边缘曾经历了怎样的分合、被模糊化，作为一个具有自身核心价值的“文化中国”却始终是真实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本意并非解构民族认同，而是在于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丰富化”与“相对化”。任何一个民族的延续，不可能没有自身